

不忘初心，凝聚责任（二）

长征开始以后，我们党对统战反蒋力量的认识，已经从争取某具体对象上升到策略高度，这对长征沿途争取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指导意义。不久，1935年1月，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批判了“左”倾“关门主义”指导下的孤军作战的做法和“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”的论调。

在随后红军长征行至云贵川地区时，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。因为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，中央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，而将要面对的敌人则是七八个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及几十万川、滇、湘、桂、黔各省军阀部队。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，继续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以减轻红军战事方面的压力，仍至关重要。

由于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蒋介石同样有着很深的矛盾，针对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頌尧曾发表反对中央军入川的声明一事，中共中央要求“必须尽量利用”“争取由中立到友好中立”。

在进入云南之前，红军争取和说服了扼守北盘江的黔军部队让出渡口和通道，使红军顺利渡江入滇。进入四川后，刘伯承以

故交旧友的名义，先后给许剑霜、邓廷秀等川康边防军旅长级军官写信，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，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。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，与集结在雅安、荣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。朱德、刘伯承还几次派人与川军第29军军长孙震联络，希望他对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康地区的计划，采取拖延和消极应付的态度。

虽然西南军阀没有像陈济棠那样回避与红军的作战，但这一时期，利用一切反蒋力量来争取长征顺利行进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。

长征开始后，国民党加大了对红军的反动宣传，诬蔑红军是“流寇”“共匪”。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欺骗了，常常是红军还未到，老百姓就人去屋空躲了起来。但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，使人们认识了共产党，反击了国民党的谎言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。

1936年2月，红二、六军团路过贵州毕节，发现老百姓家里有不少苏区发行的钱票。总指挥贺龙想，红军走后，如果敌人发现这些钱票，老百姓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，说不定还会受到残害。于是他决定，部队带上银元，一比一给群众兑换，一下子就换掉几千块银元。这些银元，是红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里缴获的，更是红军的宝贵粮饷，再这样换下去，部队就要发生困难。大伙儿劝说贺龙不要换了，贺龙严肃地说：“我们红军是人民的队伍，吃了群众的粮食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能丢下他们不管吗？”

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救老百姓，花几千块银元又算得了什么。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啊。”

贵州兴仁县大坪地寨子有位农民名叫周光明，在红军到来前，因受反动派宣传的影响，带着妻儿老小躲到山里去了。夜半时分，他看到寨子里起火，就拼命往寨子里冲去。到了家门口，只见红军战士正在奋不顾身地救火。因为天气干燥，周光明家的3间茅草房最终被烧了。但他却对红军心生感激，因为他看到了红军救火时的真诚和勇敢，特别是事后红军给了他4块大洋，让他重建家园。红军走后，周光明逢人便说：天底下只有红军最好，反动派放火，红军又救火又赔钱。

长征途中，红军所到之处，不仅严格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还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。广大群众因此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穷人的队伍。

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，每当此时，群众的帮助尤显重要。1935年11月，红二、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。一天晚上，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时煤气中毒，群众闻讯后，把鲜萝卜磨碎后加入淘米水煮沸，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吃。由于抢救及时，中毒战士全部苏醒过来。

红17师在一次作战后，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（位于广西西北部）。在经过新寨时，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，赶到路边，硬是把伤员们“抢”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。伤员们到新寨后，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

置伤员。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，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。在遇到民团搜查时，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后来，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，光荣牺牲，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，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“红军坟”，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。

这些故事到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：一支真正热爱人民的军队、得到民心的军队，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，再难的征途也必将走向胜利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：长征是宣言书，它向全世界宣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；长征是宣传队，它向十一个省两万万人民宣布，只有红军的道路，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；长征又是播种机，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将来是会有收获的。长征一完结，新局面就开始。